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辩*

——基于增长潜力研究的回答

郭英彤，张屹山，赵晓波

(吉林大学，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本身存在的不严谨之处以及公众对该定义认知上的偏差，进而说明“中等收入陷阱”情结实质上反映的是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的前景缺乏信心；为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本文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角度建立宏观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和宏观总量需求模型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预估了我国未来十到十五年的增长潜力。结果表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成熟与合理，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按照通行的判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我国将在未来8到15年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潜力；供给侧分析；需求侧分析

一、前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最近几年里倍受关注的一个词汇，特别是在国际上做空中国的势力来势汹汹的背景下，社会各界围绕我国是否会跌入这个陷阱的讨论十分热烈，意见分歧也十分巨大：一方坚持认为我们跌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高，而另一方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但是，目前还没有哪一方对这个词汇的来源和演化给予清晰的阐述。对于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又引发各界激烈争论的词汇，如果不能对其出处和产生背景给出清晰的、客观的描述，那么对于学者而言，很显然不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任其发展，则将误导公众。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能够在我国产生这么巨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改革前景缺乏足够的信心，甚至是忧虑，而这种不自信与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的增长率更是低于7%有直接关系。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尽管严格意义上讲划分发达与不发达，包括划

分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时使用的指标应该是人均国民收入（GNI），但是，由于GDP与GNI非常接近而且前者应用更广泛、更容易获得^[1]，所以不仅是学者，经济决策部门也经常把人均GDP当做人均收入使用^{[2][3]}。因此，只有通过科学的分析来证明我国的经济前景是光明的，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以及我国的增长率将会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趋势，才能够坚定我们继续改革努力前行的信心和决心。因此，本文将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入手，计量和预测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二、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议与警示

（一）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争议

我国学者一般接受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①。而且这种定义往往和拉美国家的发展经历连在一起：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

作者简介：郭英彤（1972-），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张屹山（1949-），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赵晓波（196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与资本管理。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2&ZD197），项目负责人：张屹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种子基金项目“预防性储蓄动机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体验营销和归因理论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1ZZ034），项目负责人：郭英彤。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相关数据。

① 这个定义的出处无从考证。

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时隔 40 年之后拉美国家依旧被归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一地区的增长呈现停滞状态。

但是对“中等收入陷阱”上述定义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4][5]}综合起来看，这些争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划分是否科学合理，这种划分是否应该成为一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唯一参考标准；二是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解读能否形成共识。

1. 人均收入高低划分的合理性与不足之处。当我们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讨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时，我们实际上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让中国人富裕起来，更要让中国人幸福安康，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人均收入则绝不是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唯一重要标准。人口寿命、人力资本程度、社会公平与法制程度等都是必须考察的方面。当然，所有公认的发达国家都是人均国民收入普遍高于 12000 美元的经济体，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将收入水平与发达程度联系起来是符合逻辑的，尽管也是片面的。

此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家庭收入决定了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高低则是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公认准则，而人均收入则是宏观经济研究中替代家庭实际收入的最简便可行的指标。

单纯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达程度存在的缺陷非常明显。第一，计算结果容易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偏差。第二，如果没有经过专门处理，简单计算得出的人均收入会掩盖贫富差距现象。第三，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不能准确反映出公平、民主与法制程度、福利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反映社会文明和发达程度的重要因素。

这种缺陷在划分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反映的非常突出。按照人均收入标准，海湾地区的主要石油输出国都是高收入国家，但是却不属于公认的发达国家；而“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涉及到的拉美国家中，如智利、波多黎各、乌拉圭等在 2012 年就已经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些国家也没有成为公认的发达国家。

鉴于上述缺陷，联合国开发署自 1990 年起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2010 年以后又纳入了“不平等”因素，对 HDI 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 HDI 显示，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骤然拉大。很明显，在社会公平、平等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高收入既不等于高发展水平、更不能保证持续健康的社会发

展。

2. 如何正确解读“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的是 2007 年正式发布的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报告^{[6][7]}《一场东亚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8]。尽管也有学者提到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是最早出处，但是并没有给相关出版信息，而查阅世行网站的文库和世行相关论文也没有找到该报告，因此，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还有学者称《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即“East Asian Visions: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但是这本书中没有提及“中等收入陷阱”，只提到了贫困陷阱和低收入陷阱^[9]。

但是《一场东亚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并没有将“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专用名词。只在全文概要部分的第三个子标题中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字样。该子标题下的一段论述是将“中等收入”和“陷阱”相联系的依据。“如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维持高速增长之路就如同爬坡一样艰辛。因为以要素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只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这是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必然，就如同拉美和中东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始终没有走出这一陷阱。”不难看出，这段话并不是要定义某个概念，而只是提到了拉美和中东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了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现象。与众不同的是，作者使用了“陷阱”一词对这种现象加以强调。

尽管 2007 年的这份世行报告没有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定义，其后的世行报告和研究中也很少专门探讨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现象，但是这个词却很快被世人熟知，并成为各种经济议题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以至于世行研究人员在 2013 年的工作论文中专门探讨了这个词的定义问题^[10]。这篇研究论文的基本结论是：从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结果看，“陷阱”这个词不能概括它们的增长特征，一些经济体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剧烈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并不意味着永远停滞，更不等于世界末日到来；但是“陷阱”这个概念有助于引导政策讨论。

在经济学的概念里，“陷阱”必须与某种机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机制让经济主体无法超越某种门限。经济学家广泛认可的一种“陷阱”就是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尽管“贫困陷阱”也有很多学者认可，但是认可度不及前者；究其原

因，就是对造成陷阱的机制前者能够达成广泛共识。

事实上，针对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两者之间的差距以及长期变化趋势问题，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追赶效应以及有条件收敛问题^②。这是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必备的内容，因而已无新意。在这个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确实更有吸引力和冲击力，让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二）“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未来发展的警示

结合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给我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以下几点警示。

1. 虽然我们当前经济形势诸多挑战，但是切不可妄自菲薄动摇信心。当我们回顾世行 2007 年的这篇报告时就不难发现，该报告并非要给中国当头棒喝泼冷水，相反，反而对中国的前景抱有信心、充满期待。该报告字里行间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已成为东亚地区复兴的双引擎之一，东亚国家能从 1998 年的金融危机走出来离不开中国的发展。换言之，世行的专家们并没有将“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首先，这份报告标题中“复兴”一词的使用说明作者对中国非常关注和了解，而且对我国未来发展的立场是积极的。之所以用“复兴”一词，报告作者认为东亚出现的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完全可与 14 至 16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东亚早在 1820 年就已经占据世界经济的 40%，而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东亚将在 2025 年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 40%；这是实实在在的复兴。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至少为 22%^[11]，最多为 32.9%^[12]，因此，作者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东亚复兴，实际上蕴含的则是中国复兴。同时，报告中的分析都表明东亚经济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因此，作者看好中国未来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其次，从该报告的核心观点以及对亚洲成功复兴的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的分析看，中国被作者视为经济增长的楷模和成功典范。该报告的写作目的是要回答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特别是能够持续高增长的动力。这份报告给出的核心答案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是以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为旨的增长战略非常奏效；第二是区域一体化程度的迅速提升将本地区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使得市场需求更加强劲，进一步带

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践结果，作者将中国东莞的发展历程作为最有说服力的经典案例进行了详细阐述。针对区域一体化问题，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和贡献：他们使用“中国是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推动力”作为一个标题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原义并非要强调东亚国家可能会落入“陷阱”；相反，世行 2007 年这份报告认为自 1997 - 1998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没有像西方学者预言的那样出现长期停滞，反而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这段时间里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2. 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才能减少经济增长的阻力。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跨多个学科的命题，包括行政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必须采取协调发展的模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相互协调相互支持。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风险、城市发展、社会不公、腐败等问题是我国未来发展中仍然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3. 科技创新是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根本手段，尤其应鼓励工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往往都是能够影响国际局势的高收入国家，而很多所谓的“高收入国家”因为缺少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不能享有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只有工业领域的原始性、革命性创新才能使得一国在专业分工、延长产业链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必须鼓励工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即便是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一点也极其重要；离开通讯技术与设备的创新，互联网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已经被神化了的电商们就不可能创造出“神话”，剩下的只是些概念而已。

人力资本的结构与质量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日本与韩国之所以成功跨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力资本结构完成由低级向高级梯度的转化是关键因素。而拉美国家和我国仍然没有完成这个过程，甚至出现了“壅塞”现象^[13]。因此，如何尽快提高我国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冲破瓶颈，顺利完成人

^② 该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如果落后国家能够掌握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技术，则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后者高，最终两者将达到相同的经济水平，即富裕程度相等；反之，落后国家将永远落后。

力资本结构升级就显得十分迫切。

三、潜在产出估算与预测

由于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中等收入陷阱”又让不少国人提心吊胆起来，更确切地说，这个词在中国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在于不少国人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的前景缺乏信心。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未来收入水平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检验一下“中等收入陷阱”离我们多远。

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与人均产出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高度一致，而后的可得性更强，所以本文也与很多研究一样，采用人均产出作为人均收入的替代指标。另外，由于潜在产出（本文中即潜在GDP）能够更好地描述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本文将重点估算并预测我国潜在产出的变化特征。

国内外一般将潜在产出作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唯一衡量指标，这种处理背后的逻辑是，潜在产出反映的是对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估计，也就是针对供给侧的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当前处在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关键时刻，需求侧的分析必将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前景的科学认识。因此，我们将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对宏观经济做一种结构性的分析，综合考察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长期趋势特征。由于数据所限，我们只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供给结构，即劳动、资本、技术进步；而没有讨论产业层面的特征。

此外，国内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始终有“崩溃论”之说，近年来更出现所谓“断崖式坍塌”、“断崖式衰退”的说法，本文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应该具备物理学中物体运动中的“惯性”特点：即便是失去了动力或者遇到了阻力，在初速度的作用下仍然会向前运动，而向前运动的距离和时间取决于物体的质量和阻力的大小。我国经济体量巨大，那么就应该具有较大的“惯性”，在经济转型时期且阻力较大情况下，就如同一艘航行中遇到恶劣海况且要维修动力系统的巨轮，即便动力骤然减小，虽然会减速，但是在初始速度带来的“惯性”作用下不仅不会立刻停止还会继续前行一段时间。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里，我们能够修复并提供更强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还将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为了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惯性”特点，本文将主要采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自回归模型检验相关数据是否显著具有这种特点。这种惯性对认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发展趋势十分必要。由于宏观经济

的动力系统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分系统组合而成，只有当两个分系统的动力输出相匹配时，整个经济的运行才平稳；因此，本文将对每个分系统的动力来源进行分析，考察当前每个分系统所能产生的动能和初始速度，即潜在产出的规模和潜在的增长率；进而预测在“惯性”作用下，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能达到什么水平。

（一）基于供给侧的估算

本文采用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对潜在GDP的定义，即潜在GDP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长期增长趋势，是通货膨胀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与之对应的实际GDP水平，也是一种对可持续的最大产出的度量^[14]。

1. 模型构建。本文将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作为总量生产函数估计并预测我国的潜在产出。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潜在产出测算和估计的方法多种多样，模型也越来越复杂，从各种滤波技术对GDP序列做单变量趋势分解到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状态空间模型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再到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DSGE模型；我国学者也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对中国潜在产出的估计中，如张晓艳等^[15]、郑挺国等^[16]。但是从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作为标准框架的则是最简单的以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为基础的生产函数法。对这种研究思路最早的论证来自Clark^[17]，只不过该文章测算和预测的是1948年至1980年美国的潜在GNP，而不是GDP；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采用的方法与其基本一致。此类模型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得到了普遍应用^[18]。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1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的研究人员也沿着生产函数的思路在不断改进度量指标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使用标准的增长核算框架计算我国的潜在产出水平。因此，我们在模型构建过程中参考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欧盟委员会财经事务部（Directorate - 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预测潜在产出的基本做法^[21]。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ln Y = \alpha \ln K + \beta \ln L + \ln A \quad (1)$$

其中， Y 代表总产出； K 代表资本要素投入； L 代表劳动要素投入； A 代表技术进步率，实践中往往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取代 A ，即通常所说的索罗残差； β 代表国民收入中劳动要素所占份额； α 代表资本要素所占份额。此外，对该模型附加的约束条件为规模报酬不变。这个约束是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总量生产函数时的一般处理方法，即限定 $\alpha + \beta = 1$ 。其中的道理在于，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特

别是像中国这样行业部门众多的国家而言,一些部门一些行业在一定时期里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所有部门都具有这种特点的可能性则很小;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部分行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是客观事实,对总量生产函数加以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2. 变量和数据说明。资本要素投入的衡量。本文没有使用常用的资本存量序列作为 K 的取值范围,原因有两点:其一,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 K 应该是个流量概念而不是存量概念,要把存量变为流量必须设定资本使用效率,而这个使用效率也无法直接获得观测数据;其二,对于我国资本存量的估计中资本折旧率的设定仍存在一定分歧,如果能有直接可观测的数据作为替代必将有助于提高模型的分析预测效果。根据基本经济常识,现代社会生产中,投入的资本要素必须在消耗相应一定量的能源情况下才可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能源(煤炭、电力、水、石油等)使用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准确反映资本要素的投入情况,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哪种能源作为资本要素投入的替代变量最合适。通过相关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电力消费量是最佳选择。于是,我们将来《中国统计年鉴》上可以查到的生产性电力消费量(1980—2012年)整理成指数序列作为 K 的样本数据。

劳动要素投入的衡量。发达国家在衡量劳动要素投入时选择的是劳动者工作时间,但是我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最初选择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全国年底就业人数作为替代指标。但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这个序列在1990年前后发现剧烈跳跃,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连贯性,我们最终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提供的修正后的全国年底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然后将各年的数值转换成指数形式。

劳动要素收入份额(β)与资本要素收入份额(α)的确定。这两种份额都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往往需要间接获得。我们采取的是核算方法,与通过回归分析获得要素份额的方法相比,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其一、更接近真实值,因为要素份额来自对可观测数据的会计核算;其二、允许要素份额时变,这个特点能够更客观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结构。具体而言,由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可以查到1993—2013年的各地区劳动报酬数据^③,但是年度有限,我们只将根据这类数据计算出全国的平均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作为参照序列使用,同时,根据统计年鉴中公布的1978年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构成以及相关人口和GDP数据,我们又计算出几组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序列与参照序列进行比较。经过比较,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劳动报酬替代指标所获得的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序列与参照序列最接近,而且比后者平滑,特别是没有出现后者在2003、2004年前后无法合理解释的剧烈波动。因此,我们使用前者作为 β 的数据来源。然后,通过 $(1 - \beta)$ 获得资本要素份额(α)的数据。

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总产出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提供的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现价GDP进行平减后的实际GDP序列。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

$$TFP = \ln Y - \alpha \ln K - \beta \ln L \quad (2)$$

3. 计算结果与预测。为了计算潜在产出,我们使用HP滤波对代表资本投入的生产用电量指数序列、代表劳动投入的就业人数指数序列、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序列进行了处理,从而得到了代表各个序列趋势成分的数据序列。然后,按照(1)式计算出潜在GDP;其中, α 的值按照每八年变化一次设定,八年之内各年的 α 值取八年的平均值, β 按照同样方式设定;这样处理既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照顾到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表1给出的是本文计算出的样本期间内劳动要素份额 β 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水平,从中不难看出 β 的变化趋势;同时,与使用回归方式计算出的TFP不同,本文得到的TFP序列具有显著的增长趋势,这一特征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效率稳步提高的实际情况。

由于生产性电力消耗量的数据只能截止到2012年,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潜在GDP也只能计算出样本区间内数值。从计算结果看,潜在GDP的水平值与实际GDP一样,也呈现出上升趋势。由于我们关注的是长期趋势,因此,我们计算了两者的增长率,并进行了比较,见图1。其中实际GDP增长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提供实际GDP序列计算得出。

^③ 1980—1993年的统计年鉴中每隔五年左右才公布“投入产出表”,因此,这段时间里的“劳动报酬”数据很少。

表 1 历年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年份	β	TFP	TFP 变化率 (%)
1980	0.54	0.10	
1981	0.57	0.14	0.05
1982	0.62	0.19	0.05
1983	0.63	0.24	0.05
1984	0.61	0.29	0.05
1985	0.56	0.34	0.05
1986	0.57	0.38	0.05
1987	0.54	0.43	0.04
1988	0.52	0.47	0.04
1989	0.53	0.51	0.04
1990	0.55	0.55	0.04
1991	0.52	0.60	0.04
1992	0.49	0.65	0.05
1993	0.46	0.69	0.05
1994	0.46	0.74	0.05
1995	0.47	0.79	0.05
1996	0.48	0.84	0.05
1997	0.48	0.89	0.05
1998	0.48	0.94	0.04
1999	0.49	0.98	0.04
2000	0.47	1.01	0.04
2001	0.47	1.05	0.03
2002	0.48	1.08	0.03
2003	0.48	1.11	0.03
2004	0.46	1.14	0.03
2005	0.45	1.16	0.03
2006	0.42	1.19	0.03
2007	0.43	1.22	0.03
2008	0.42	1.23	0.03
2009	0.43	1.28	0.03
2010	0.42	1.31	0.03
2011	0.42	1.34	0.03
2012	0.43	1.37	0.03

注：TFP 水平是原值基础上的对数序列。

从图中不难看出，潜在 GDP 增长率的波动幅度

明显小于实际 GDP 增长率，这正反映了潜在 GDP 的根本特点和构造潜在产出模型的初衷，即，刻画 GDP 的长期增长趋势；从潜在产出的定义出发，这种趋势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长期增长趋势波动剧烈，则极有可能是模型设定偏差导致的。从图 1 中潜在 GDP 增长率的走势和波动情况看，我们的模型比较符合理论要求和我国国情。通过多次模拟比较，我们发现潜在 GDP 增长率曲线的几次跳跃完全来自要素收入份额 α 和 β 的变动，也就是说，当 α 和 β 发生变动后，潜在产出增长率会发生明显的跳跃性波动，但是会很快回归到长期趋势水平^④。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日趋成熟，越来越合理。

从变化过程来看，1980 年的潜在 GDP 增长率为 11.4%，2012 年的潜在 GDP 增长率为 7.48%^⑤，三十二年的时间里潜在 GDP 增长率逐渐下降了 3.92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0.12 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我国潜在 GDP 增长率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会降低到 5% 左右。而 5% 的增长率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亦是非常高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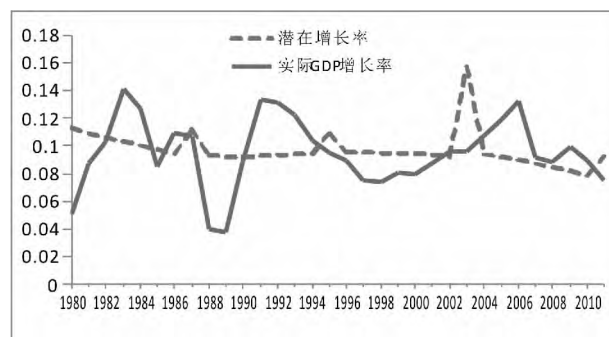


图 1 实际 GDP 增长率与潜在 GDP 增长率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计算结果得到相关数据。

从表 3 可以看出，使用 AR (1) 模型对潜在 GDP 增长率直接预测的结果高于先对要素序列的趋势进行预测，而后按照生产数法计算进而得到的潜在 GDP 增长率预测结果。由于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 2013 年和 2014 年我国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7.7% 和 7.4%；那么，可以说，对要素序列的趋势进行预测而后按照生产数法计算出的潜在 GDP 增长率更接近实际值。不论是哪种方法，从趋势上看，潜在 GDP 增长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态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供给侧得到的潜在产出增

④ 其中最为剧烈的一次发生在 2003 - 2004 年，对应的是资本要素收入份额由 0.52 上升到 0.568；劳动收入份额由 0.48 下降到 0.43。

⑤ 按照八年调整一次要素收入份额的计算方法，2012 年刚好遇到调整，潜在增长率曲线出现一次跳跃；因此，我们通过平滑手段消除了跳跃得到 7.48% 这个值。

长率高于现实中的 GDP 增长率这个结果反映的是虽然我国资源条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实际生产活动中存在的资源错配和使用不当等低效率现象导致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没有达到最大的均衡产量水平。

通过对 α 和 β 的不同设定,我们对预测结果进行了数次模拟,最保守的预测结果是潜在 GDP 增长率到 2020 年下降至 6.3%。此外,由于目前的预测技术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导致长期预测的结果往往不稳健,因此,我们只预测到 2020 年。

从潜在 GDP 的定义可知潜在 GDP 增长率相当于现实中实际 GDP 增长率的趋势值,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一个参照基准。由此,我们取上面潜在 GDP 增长率计算结果中的 6.3%, 7.48%, 以及一个假设的极端值 4% 分别作为未来实际 GDP 年均增速进行测算,预计我国实现的人均 GDP 水平超过 12000 美元—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的时间将分别为 2024 年、2022 年和 2030 年^⑥。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我们再用 8 到 15 年的时间就能完成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因此,从供给侧的分析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

表 2 潜在 GDP 增长率预测结果

	生产函数法核算 (%)	直接预测 (%)
2013	8.03	8.99
2014	8.16	8.94
2015	8.09	8.9
2016	8.03	8.86
2017	7.96	8.82
2018	7.90	8.77
2019	7.84	8.73
2020	7.79	8.69

(二) 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国的总产出将主要分配给四个部门使用,即家庭、企业、政府和外贸部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收入恒等式:

$$Y = C + I + G + NX \quad (3)$$

式 (3) 中等号左边的 Y 代表一个经济体一年内的总产出,等号右边的各项就是对总产出的需求,依次代表居民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使用了根据中国国情

编制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即《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其基本形式为,

$$GDP = \text{最终消费支出} + \text{资本形成总额} + \text{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quad (4)$$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 = 居民消费支出 + 政府消费支出。这样一来,对我国宏观经济需求面的分析就可以转化为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等四方面的需求规模的估计。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也日益强大,无论是从统计数据上看还是从公众反映上看,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都呈现增长势头。因此,对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侧的分析应该集中在对上述四类需求的长期趋势分析与预测,从中获得我国宏观经济总量需求的规模和潜力,进而判断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会不会出现需求短边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乏力。

为了实现这一分析目标,我们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述四类需求的历史数据(1978—2013)进行了 HP 滤波处理,然后以 ARIMA 模型为基础模型对各个序列进行了预测^⑦,从而得到对未来八年(即样本期外推至 2020 年)我国各类宏观经济总量需求的规模和潜力的预测结果,然后进行加总得到需求侧分析下 GDP 总量的预测结果。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和比较,我们将 2013 年我国的名义 GDP 水平作为固定基准进行预测,并按照 2013 年年初的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作为不变汇率进行折算。为了更进一步比较人均 GDP,按照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增长率计算,我国人口数量到 2020 年将突破十四亿,综合考虑人口结构变动因素,并为了简化计算,假定 2020—2022 年我国的总人口维持在十四亿不变。我们的预测结果显示:如果我国经济按照 2013 年以前的模式发展,那么,到 2020 年,我国以人均 GDP 衡量的宏观需求规模将超过 12,200 美元,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改革的新时期,经济结构转型的攻坚战已经开始,因此对未来的预测也需要作出调整。具体调整包括:(1) 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原来的 10—11% 调低至 8%,如此设定是为了与供给侧分析中的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保持协调;(2) 将政府消费增速由原来的 7.5—8.0% 调低

^⑥ 主要的限制条件包括:以 2012 年现价 GDP 水平为基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按照 2012 年年末水平计算,同时人口增长率假定为固定值 4.92‰(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3》)。

^⑦ 所有序列都进行了平减处理,扣除了价格因素。净出口序列的预测使用的是 ARMA(1,1) 模型。

到 6%，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政府支出，我们没有将政府消费增速调整过多。根据调整后的预测结果，我国人均 GDP 到 2020 年将达到 10,834 美元；到 2021 年将达到 11,648 美元，到 2022 年超过 12,000 美元。

根据预测的 GDP 水平值，我们将其转换成 2014—2020 年的增长率，结果见表 3。从表中不难看出，为提高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而进行的结构调整尽管将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但是仍可以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当前出现的增长率下滑不应该让我们失去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

表 3 根据需求侧分析对 GDP 增长率的预测

	不改变发展模式情况下的增长率 (%)	转换发展模式情况下的增长率 (%)
2014	8.97	7.22
2015	8.95	7.23
2016	8.93	7.23
2017	8.91	7.24
2018	8.90	7.24
2019	8.90	7.25
2020	8.97	7.2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需求侧分析中，净出口序列波动剧烈，而且受外部冲击和结构与政策变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对未来的预测较难把握。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我们考察了另外两个潜在市场：2007 年以来中国境外旅游消费市场以及贫困人口脱贫将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

首先，中国境外旅游消费市场。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10 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为 549 亿美元，2013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649 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没有扣除公务出国的支出，但是，中国游客境外疯狂扫货是很多人都亲历过的，因此，很多有识之士也提议相关政府部门重新制定对进口消费品的税收政策避免本国资金外流；而且有报道称相关部门将于今年下半年试点进口奢侈品降税政策。我国境外消费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贫困人口脱贫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按照 2013 年以前的扶贫标准：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 2300 元人民币，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 330 元人民币，我国农村有 8249 万贫困人口，城市有 2143.5 万低保对象。中央政府的目标是 2020 年实现彻底脱贫目标。如果届时农村贫困人口达到 2013 年

农村平均年纯收入水平，城市低保人口达到 2013 年城市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将意味着扣除人口变动因素后，我国 GDP 水平应该增加 10,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而我国 2013 年净出口总额按照现价计算为 14151 亿元人民币，即便是净出口遭受巨大的负面冲击，如果将我国境外消费规模和脱贫计划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张考虑进来的话，我国的宏观市场需求规模也应该达到我们的预测水平。

四、结语

随着最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的讨论特别是针对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我们的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一个严谨的定义，存在较大争议，目前属于过度解读。我们认为，应该使用其它更严格的概念取而代之，避免误导公众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必要的纷争。因为这将会动摇我们对国家经济前景和经济改革的信心，让社会经济活动迷失方向。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分歧才能有助于集中精力谋发展，振奋精神图改革。

从供给侧的分析结果看，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很大潜力：根据对宏观总量生产函数的预测，我国在未来 8—15 年的时间里将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未来劳动力供给是否会出现短缺的问题。由于劳动力供给直接影响到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劳动要素投入，而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出生率也持续下降，因此，很多学者也担心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的预测结果表明，至少到 2020 年，我国的劳动要素投入趋势不会出现显著的大幅度下降，能够保证 7%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到 2030 年之前，这种对劳动要素投入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原因在于，尽管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已为人所知，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失业率维持在 4% 左右（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4》），特别是 2011 年以来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在六百万以上，就业压力并没有明显缓解，这种局面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从总量上看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的“用工荒”折射出的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和市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反应滞后。

需求侧的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的市场规模仍然处在稳步扩大的阶段，根据预测结果，到 2023 年前后，我国市场规模所蕴含的宏观总需求能够保证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跨越人均

GDP12,000 美元的目标。(2) 需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降低投资增长率和政府支出增长率将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即预测的经济增长率由结构调整前的接近 8.9% 以上降低到调整后的 7.2% 左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存在内在联系。(3) 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率非常平稳,因此,只要投资增速和政府支出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的。所谓合理区间中的“合理”是指,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活动需要足够数量的投资,而我国的巨大消费市场意味着生产活动所需的投资数量也非常庞大,因而,投资增速不能过低;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政府支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而且能够在最晚 2030 年左右实现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遇到的困难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克服的。

参考文献:

[1]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 2013 (9): 17—29.

[2] 孔泾源.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 改革 2011 (10): 5—13.

[3] 王一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 中国投资 2013 (3): 24—29.

[4] 权衡,罗海蓉.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与争论: 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J]. 学术月刊 2013 (11): 86—96.

[5] 权衡,罗海蓉.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与争论: 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J]. 学术月刊 2013 (11): 86—96.

[6]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 经济学动态 2011 (12): .

[7] 全毅.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的经验及启示[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2): 70—75.

[8] Gill I., Kharas H.,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R]. Washington D. C.: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2007.

[9] Gill I., Huang Y., Kharas H., East Asian Vi-

sions: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 Washington D. C.: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2007.

[10] Im F. G., Rosenblatt D., Middle - 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No. 6594.

[11] 刘逊. 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 GDP 的估算—基于 1600—1840 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J]. 清史研究 2010 (2): 48—55.

[12] Maddison A.,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 - 2030 AD [M]. Paris: published by OECD, 2007.

[13] 袁富华,张平,陆明涛. 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 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J]. 经济学动态 2015 (5): 11—21.

[14]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BO method for estimating potential output: An Update [R]. 2001, August.

[15] 周晓艳,张杰,李鹏飞. 中国季度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再估算: 基于不可观测成分模型的贝叶斯方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10): 3—19.

[16] 郑挺国,王霞. 中国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及其可靠性研究[J]. 经济研究 2010 (10): 129—142.

[17] Clark P. Potential GNP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 - 80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79 (2): 141 - 165.

[18] Adams C., Fenton P. R., Larson F. Potential Output in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7.

[19]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 基于生产函数法的潜在产出估计、产出缺口及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978 - 2009 [J]. 金融研究 2011 (3): 42—50.

[20]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减速的结构性特征、转型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J]. 经济研究 2013 (10): 4—17.

[21] Havik K., McMorrow K., Orlandi F., et al.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Potential Growth Rates & Output Gaps [J]. Economic Papers, 2014, No. 535.

(编辑校对: 韦群跃 陈崇仁)